

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小石手批《靖节先生集》述要

卞东波

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有著名学者、原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小石先生的藏书《靖节先生集》一部,上有小石先生朱笔批点数十条,短则数语,长则百十字,有如一则诗话。这部批点本尚未见披露,然对于陶渊明研究及胡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,今不揣谫陋,对胡先生手批《靖节先生集》略作研考。

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这部胡小石先生手批《靖节先生集》,线装四册,底本为清光绪九年(1883)江苏书局刊陶澍所注《靖节先生集》,凡十卷及附录,卷首为例言,卷一至卷四为诗,卷五至卷七为文,卷九至卷十为托名陶渊明所作的《五孝传》、《集圣贤群辅录》及《诸家评陶汇集》,卷末附录《靖节先生年谱考异》。扉页有胡先生题款四行:“陶注陶集四册。甲子秋八月,托天一书局,寄自苏州。”江苏书局为清官办书局,设于苏州,所以未有“寄自苏州”之语。“甲子”年可能为民国十三年(1924),所以批语当作于本年及其后。

胡小石先生(1888-1962),名光炜,字小石,号倩尹,又号夏庐,晚年别号子夏、沙公。1888年生于南京,祖籍浙江省嘉兴市。1909年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农博科。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、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、金陵大学、东南大学、中央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、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等职。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、图书馆馆长。1924年,胡先生出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,这部《靖节先生集》就可能批于先生移砚金大之后,也是其身后捐献给南大图书馆藏书的一部分^①。

胡小石先生治学范围极其广泛,学涉古文字、声韵、训诂、经、史、诸子、佛

^①胡小石先生生平参见吴白匋《胡小石先生传》、曾昭燏《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》,皆载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《古典文献研究(1989-1990)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2年。又参见谢建华《胡小石先生年表》,周勋初先生编《胡小石文史论丛》附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8年。

典道藏、金石字画、辞赋、诗歌、词典、小说等领域。他的主要著作收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、1991年、1995年出版的《胡小石论文集》及续编、三编中。胡先生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论述主要见于1928年出版的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(上海人文出版社)一书中,手批本《靖节先生集》很多地方可以与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相对应。从这部手批本可以看出,胡先生为了撰写这部文学史,曾经仔细研读过中国古代主要作家的文集。这部手批本非常宝贵地留下了胡先生当年研读陶渊明诗的学思历程。众所周知,胡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,这可以从1988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胡小石书法选集》一书中略窥一斑。手批本《靖节先生集》全为胡先生用蝇头小楷写成,字体娟秀,一笔不苟,极具书法价值。手批本的评点集中于前四卷,主要是对陶渊明诗歌的批评与研究,涉及到陶渊明诗集的文字校勘、文本训释、陶渊明的生平考证、陶诗艺术分析、陶渊明文学史地位变迁之探讨以及陶渊明诗歌的渊源与流变的研究,在陶渊明研究史上多有发覆之见。

二

关于陶渊明生平的研究,手批本主要集中在陶公的享年问题上,这个问题至今仍是陶渊明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与热点。陶渊明的享年有多种说法,传统的是《宋书》的六十三岁之说。另外还有张纘的七十六岁说,吴挚甫的五十一岁说,古直的五十二岁说,梁启超的五十六岁说等等^①。胡小石先生比较倾向于梁启超的五十六岁说。他在引用《陶征士诔》“春秋若干”之说后,认为:“《文选》不书岁数,此云六十有三,当是后人据《宋书》补之。”这实际上否定了《宋书》之说。胡先生在研读陶集的过程中,发现了陶渊明之自叙与史书记载的矛盾,如批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中“闲居三十载”一句,云:“依古注则辛丑,公年二十六,似不得云‘闲居三十载’也,若改‘三’为‘二’则又无确证。”古直《陶渊明年谱》最早提出“三十”为“二十”,他举出了大量的例子,认为“‘二’、‘三’形近,每易互讹”。古直的观点,得到了当代学者袁行霈先生的认同,但胡先生则认为“又无确证”,主要是古直的考证并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,而建立在推测之上。关于陶公之享年,胡先生主梁启超五十六岁说,这在《游斜川》的胡先生批语中有明确的表示:“近人梁氏于此首辛丑云‘当作辛酉’。‘五日’当作‘五十’。因推定渊明卒年五十六非六十三。其说甚辨,昔考所未及。说见所作《陶渊明年谱》八十九、九十诸页。”胡先生为了证成此说,又引了一例,加以说明:

东坡《和游斜川》诗云:“虽过靖节年,未失斜川游。”施注引渊明《游斜川》诗:“开岁倏五十,吾生行将休。”是宋本固有作“五十”者。又案东坡和陶诗,起谪儋耳以后(见子由和陶渊明诗引)。谪儋州时,在绍圣四年

^①参见袁行霈:《陶渊明享年考辨》,《文学遗产》1996年第1期。

丁丑，坡年六十四，故云“虽过靖节年”也。由坡和诗推之，知北宋时，此诗固作“五十”矣。

“五日”作“五十”已经为善本所证实，如宋刻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》及宋绍兴刻本《陶渊明集》均作“五十”。虽然东坡和陶并不始于谪儋州之时^①，但《和游斜川》作于儋州时无疑^②。胡先生还依据梁启超的五十六岁说列了一个陶公晚年的年表：

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	五十
三年壬戌	五十一
少帝景平元年癸亥	五十二
文帝元嘉元年甲子	五十三
二年乙丑	五十四
三年丙寅	五十五
四年丁卯	五十六

尽管关于陶渊明享年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，但从胡先生对陶公享年问题的考证来看，他重视的是陶诗本文，又通过东坡和陶诗来考索宋人所读到的陶诗文本。陶渊明生平史上这一问题，实关系着对陶诗的正确理解，对于研究陶渊明晚年生活与晋宋之际的政治变动意义重大，所以胡先生才会在手批的过程中予以特别表出。

胡先生批点本的底本是陶澍注本，尽管这部著作是现代以前《陶渊明集》校注的最佳版本，但未尽之义也所在多有。胡先生在批阅的过程中，就经常对陶诗进行校勘，也取得了不少新义。如批《影答形》中“憩荫若暂乖”一句，关于此句中的“荫”字，胡先生一方面云“汤本云一作‘阴’”，另一方面也指出：“此语本《庄子》‘处阴以休’句，作‘阴’是。”这种校勘结合了他校与理校，因而结论非常可信。又《拟古》其二“闻有田子泰”一句，胡先生批云：

以名字相符之例言之，“畴”当字“子春”，作“泰”者，形近而误。《西溪丛语》引此，正作“子春”。

此句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集》正作“田子春”，胡先生的考证无疑是正确的。今人袁行霈教授认为“春，一作‘泰’，亦通”^③，则过于审慎。又关于陶渊明

①实际上，东坡在元祐七年(1092)知扬州任上时就已经开始追和陶诗，在贬谪儋州之前的惠州也大量创作了和陶诗。《冷斋夜话》卷七载：“东坡在惠州，尽和渊明诗。黄鲁直在黔南闻之，作诗云：‘子瞻谪岭南，时宰欲杀之。饱吃惠州饭，细和渊明诗。彭泽千载人，子瞻百世师。出处虽不同，风味略相似’。”不过到儋州后，苏轼的和陶诗更加炉火纯青，并且对和陶诗进行了整理，即苏辙《栎城后集》卷二十一《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》所云的“集而并录之”。

②蔡正孙：《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》卷三，蔡正孙注云：“此诗在儋耳作。”韩国高丽大学图书馆藏本。参见卞东波：《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13年，第392页。

③袁行霈：《陶渊明集笺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，第320页。

生平部分,陶澍年谱“简文帝咸安二年壬申,八岁”条,胡先生批云:

颇疑《祭程氏妹文》中之“慈妣早世,时尚孺婴”云云,“慈妣”当作“慈父”,后人误改之,不知父古亦称“慈”也。下云“我年二六,尔才九龄”,与此文相及,龆髻相合,则《祭妹文》之“昔在江陵,重罹天罚”亦与上无牾矣。

胡先生此一观点可谓空谷足音,在今天的陶渊明研究中也鲜有持此见者。比如袁行霈先生就认为,“慈妣”“此指渊明庶母,程氏妹生母”^①。这一看法由来已久,胡先生认为:“此亦强解,若‘慈妣’但为程氏妹之庶母,不应之叹‘我与尔特百常情’之痛深也。”笔者认为,胡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。陶渊明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云:“一欣侍温颜。”此诗作于晋安帝隆安四年(400),陶渊明正在桓玄幕中作幕僚,其母仍健在,不得言“早世”,所以胡先生的推断是有道理的,可见胡先生之读书得间,能在前人未措意处发现问题。

以上是校勘。胡先生对陶诗的训诂也颇多胜义,如《归园田居》其四:“试携子姪辈,披榛步荒墟。”关于“姪”字,胡先生批云:

一学友作文称人见之子为“姪”。凌仲子讥之,谓姪娣乃女子之称,未有通诸。男子称姪,宋以后之俗称也。案《后汉书·邓后传赞》云:“爱姪微愆,髡剔谢罪。”李贤注云:“太后兄骠子凤受遗事泄,骠遂髡髮及凤以谢天下。”是“爱姪”指邓凤,凤固男子也。男子称姪不必自宋后。此诗以子姪连文,当亦称男子。

关于此句,历来治陶者鲜有议论,就是争议的焦点“姪”字在宋刻递修本中也作“侄”。此句作“姪”或“侄”并不影响诗意,不过看了胡先生的阐说后,仍可增加我们对此两字意义的理解。再如《饮酒》其四“鼎鼎百年内”,“鼎鼎”一作“订订”,胡先生似乎认为“订订”为优,云:“‘订订’犹‘亭亭’也,下文‘冉冉星气流,亭亭复一纪’。”此亦是以陶证陶的方法,其说值得重视。又《饮酒》其十“恐此非名计,息驾归闲居”,胡先生批云:

《尔雅·释训》曰:“猗、嗟、名兮,目下为名。”“恐此非名计”,《檀弓》“子夏丧其子,而丧其明”。《冀州从事郭君碑》云:“卜商号咷,丧子失名。”是“名”与“明”通。诗本偕“名”为“明”,此云“名计”犹言“明计”矣。

胡先生此释甚的,袁行霈先生亦指出:“‘名’通‘明’,见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。”^②袁先生可能没有见到胡先生的阐释,但英雄所见略同,如果能附上胡先生的意见无疑会更精彩。又《饮酒》其十三“规规一何愚,兀傲差若颖”,胡先生批云:“差,支次也,不齐等也。”而袁先生对“差”没有单独解释,认为“差若颖”,意为“较似聪颖”^③。又《饮酒》其二十“如何绝世下”,胡先生

①袁行霈:《陶渊明集笺注》,第544页。

②袁行霈:《陶渊明集笺注》,第260页。

③袁行霈:《陶渊明集笺注》,第267页。

批云：“哀十五年，《左传》：‘大命陨坠，绝世于良。’杜注‘绝世’，犹弃世也。”历来对“绝世”并无专门解释，丁福保《陶渊明诗笺注》认为“绝世下，谓汉世既绝之后”，袁先生亦持此说^①。此二处胡先生的解释皆值得参考。陶公《止酒》历来叹为绝作，全诗用了二十个“止”字，而意思并不完全一致，袁行霈先生指出：“此诗共二十句，每句用一‘止’字，共二十处。但‘止’字涵义不尽相同，有停、至、静止等义，以及作语末助词之止。”^②辨析甚精，然胡先生对此早有抉发：“此篇用‘止’字，同文异义凡三。一、‘闲止’之‘止’，语助也。二、‘止园葵’、‘止稚子’之‘止’，所以限好味士颜。三、止皆动字。”胡先生本人就是文字学家，对甲骨文就深有研究，所以从其对陶诗词汇并不多的训释即可看出其极好的古学功力，其解释或引经据典，或以陶证陶，所以其得出的结论，或孤明先发，或鞭辟入里。我们今天再次笺注陶集时，应该要多多吸收胡先生的意见。

胡先生批语还有极少一部分涉及陶诗的用韵，如《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》：“寝迹衡门下，邈与世相绝。顾眄莫谁知，荆扉昼常闭。凄凄岁暮风，翳翳经日雪。倾耳无希声，在目皓已洁。劲气侵襟袖，箠瓢谢屡设。萧索空宇中，了无一可悦！历览千载书，时时见遗烈。高操非所攀，深得固穷节。平津苟不由，栖迟诎为拙！寄意一言外，兹契谁能别。”全诗押入声韵，然“闭”非入声，似乎出韵，胡先生认为：“‘闭’韵押入，盖晋宋间四声之辨犹未严也。”这一短短的批语不但解释了这首陶诗的用韵问题，而且还概括了晋宋之时诗人用韵的样态。

如果结合胡先生其他的著述，如《杜甫〈北征〉小笺》、《杜甫〈羌村〉章句释》，便会发现，其解释风格与胡先生对陶诗的批点如出一辙，完全体现了周勋初先生所概括的“体察之细”、“功力之深”两大特点，这与胡先生受到清代朴学传统及扬州学派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^③。

三

胡先生的批语还有不少内容是将陶渊明放在文学史脉络中，分析其文学渊源及其流变，胡先生认为陶渊明受到阮籍很大的影响。如批《拟古》（“迢迢百尺楼”）云：“此陶公摹阮之作。”并抄写了阮籍《咏怀诗》中“独坐空堂上，谁可与欢者？出门临永路，不见行车马。登高望九州，悠悠分旷野。孤鸟西北飞，离兽东南下。日暮思亲友，晤言用自写”一诗，以显其渊源。这一观点亦见于胡先生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中：“他最得力的是阮嗣宗的《咏怀诗》，如‘迢迢百尺楼’，及‘种桑长江边’之类，他的最著的诗，如《拟古》、《饮酒》、《述酒》及

^①袁行霈：《陶渊明集笺注》，第285页。

^②袁行霈：《陶渊明集笺注》，第287页。

^③分别见周勋初：《〈胡小石文史论丛〉导读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9、1页。

《读山海经诗》，无一而不是学嗣宗的。”^①胡先生的观察无疑是非常准确的，锺嵘《诗品》仅指出陶诗在风格上受到应璩与左思的影响，却没有看到“殆如田家语”的陶诗与“厥志渊放，归趣难求”的《咏怀诗》之间的联系。其实，陶诗与阮诗在精神意旨上极其相似，都表达了一种内心的孤独。胡先生还指出了陶诗另一些渊源，如批《命子》云其“发端学韦孟”。《命子》开头“悠悠我祖，爰自陶唐”云云，确实与韦孟的《讽谏诗》开头“肃肃我祖，国自豕韦”（《文选》卷一九）相似。又云《形影神》“三诗似从《齐物论》罔两问影一节化出”，其相似之处在于用拟人手法写虚拟角色之间的对话，此论堪称卓见。胡先生又指出阮瑀的《咏史诗》和王粲《咏史诗》，“此二诗为陶《荆轲诗》所出”，则从六朝文学的谱系中，揭示了陶诗与先前文学间的互文性^②。

胡先生的批语还多次指出陶诗在后世文学，特别是在唐代文学中的反响，如批《形影神》云：“卢仝《萧宅》诗滥觞于此。”《形影神》组诗三首主要是形影神之间的赠答，而卢仝《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》则写了客、石、竹等之间的赠答，写作形式颇似于《形影神》。又批《饮酒》（其五）中“青松在东园，众草没其姿；凝霜殄异类，卓然见高枝”云：“王维《西施咏》‘艳色天下重，西施宁久微。朝仍越溪女，暮作吴宫妃。贱日岂殊众，贵来方悟稀’云云。从‘青松’诗出也。”则指出了陶渊明笔下的“青松”与王维笔下的“西施”都有一种不为人所知的寂寞之美。又批《游斜川》云：“杜《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》诗云：‘朝来偶然出，自卯将及酉。久客惜人情，如何拒邻叟？高声索果栗，欲起时被肘。指挥过无礼，未觉村野丑。月出遮我留，仍嗔问升斗。’出此诗。”《游叙川》写陶公“与二三邻曲，同游叙川”之时“提壶接宾侣，引满更献酬”之乐，而杜诗则写了老杜受田父之邀作客饮酒之事，田父之好客跃然纸上。两诗在描写与邻居饮酒上有相似之处。又批《止酒》诗云：“昌黎《落齿》诗（《东雅堂》卷四）前半以‘落’换，全仿此作。”韩愈《落齿》诗多次重复用“落”字，与陶公《止酒》诗每句都出现“止”字异曲同工。批《杂诗》（其二）“欲言无予和，挥杯劝孤影”，指出“唐人‘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’之所出”。所引之唐诗乃李白之《月下独酌》，此两诗皆以拟人之法，写月下之影与诗人之间的互动。这让我们看到，陶诗在宋代成为经典之前，对唐人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从上可见，胡先生在研读陶集时，有明确的源流意识，将陶渊明纳入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加以观照，这无疑可以更加细微地观察到陶渊明在文学史脉络中的地位。同时，这也给我们一点启发，即我们在笺注陶集时，除要注重对陶诗出处的考证外，如果能指出陶诗所用的语汇、意象、句法在后代作家那里的传承，则更善莫大焉。如果能像胡先生所做的那样，将陶诗在唐诗中的反响抉

①《胡小石论文集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79页。

②关于陶诗与前代文学间的互文性，参见范子烨：《春蚕与止酒：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2年。

发出来,其意义不亚于指出其源头,更可以看到一部流动的陶诗史。

关于陶渊明文学史地位之变迁,这部胡批陶集亦有涉及:

渊明文在南朝人眼中无位置,身后如之在世。梁昭明、简文帝、《文心》论文,无一字道及。阳休之云:“余览陶潜之文,辞采杂未优,而往往有奇绝异语,放逸之致。”渊明藻采淡,故与时异尚耳。

今本《诗品》陶公在中品,世颇以诟病记室,其实误也。古本《诗品》本置陶上品。《御览》五百八十六引鍾嵘《诗评》,古诗、李陵、班婕妤、曹植、刘桢、王粲、阮籍、陆机、潘岳、张协、左思、谢灵运、陶潜十二人,诗皆上品。其下录至陶诗评语“古今隐逸诗之宗也”止,则唐本上品本有十二人,陶公在内。今本上品至大谢止,不知后人何时所改。

沈约以齐梁间人,言渊明事而舛误如许,其故何也?盖陶公之见重文苑,乃自唐宋以降,储、柳摹之,东坡效之,于是秉笔之士殆无不读渊明集者矣。然其在当代,则刘勰作《文心》,历品才略,曾无片语及陶;鍾记室作《诗品》,亦第列之中品。当时称之者惟昭明、简文兄弟,而昭明撰《文选》,采诗才止八首,与前代之曹、王、潘、陆并世,比之颜、谢,相去多矣。盖南朝文尚偶丽,罕取单行,故尔时言文者率宗《汉书》,鲜言《史记》,可以证也。渊明率真,不重藻绘,运章不尚排比,自与时趋相乖也。顾当时阳休之序录云“余览陶潜之文,辞采虽未优,而往往有奇绝异语,放逸之致”云云。但惊其高奇,未许其辞采,其最见矣。又明远高骞,实胜延年,亦以好单,鍾氏列之中品。齐梁间风会殆后一改,若其“才秀人微,取湮当代”,亦复与鲍一辙。此其平生所以不详于史家之目也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,音注《史记》者才有三家,音注《汉书》者则有十七家。入唐则就《新书·艺文志》所载,则《史记》增许、刘、御三家,《汉书》增御定、顾、颜三家。又《史记》增王、徐以后九家,《汉书》增刘、敬以下六家。

这三段批语牵涉到陶渊明接受史上两段公案,其一是陶渊明在其同时代人眼中之地位的问题,其二是鍾嵘《诗品》置陶渊明于中品的问题。

陶渊明在六朝人心目中基本上是一位隐士的形象,这可以从他一人而入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三史的《隐逸传》可以看出,其友人颜延之所写的《陶征士诔》也称其为“南岳之幽居者”。至于其文学影响,颜延之也仅言“文取旨达”,北齐阳休之也认为其“辞采杂未优”,故胡小石先生一言以蔽之曰“渊明文在南朝人眼中无位置”,其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:“我们现在提起陶渊明,大家都一致承认他是千古大诗人中之一位。但他在当时的地位,却远不及谢灵运。”^①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,上引批语给出一个原因“渊明藻采淡,故与时异尚耳”,并在第三段评语中加以发挥;而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中胡先生给出两个原因,“第一,是由于六朝人的门阀观念太重。”“另

^①《胡小石论文集续编》,第79页。

外还有一个缘故,就是他的诗的风格与当时所流行的大相违背。”^①批语中列出的原因可与《讲稿》中第二点相参:“当时文人均喜复笔派之《汉书》,而不欢迎单笔派之《史记》,故作诗亦专讲排偶,重词采。那时正是太康派得盛,所以大谢竟为一代宗匠,而陶公的诗喜用单笔,而且色采冲淡,显然与当时一般人的胃口不合。”从上可见,胡先生从批语到《讲稿》,论述的逻辑始终保持着一致,可见这是他一贯的想法,而且批语解释的内容还比《讲稿》要丰富。

关于陶渊明不显于六朝,胡先生给出了外部与内部的两个原因,前一个原因,即陶公出身寒族,历来论之甚多;而从文学的角度,特别是结合学术史上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两家在六朝地位之升降,来说明单笔之衰落而复笔之流行,而陶渊明正是单笔的追随者,自然在喜复笔的时代氛围中成为落伍者,此种观点则为胡先生首先提出。研究者经常指出六朝文风尚骈词俚句,而陶公不事丽藻,故不入时人法眼;然鲜能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之流行及其与时代之风会之关系的视角出发论述,故胡先生此一论断洵为不刊之论,历数十年仍有生命力。

批语中关于《诗品》一段,与《讲稿》陶渊明部分最后一段几乎相同:

把陶公置于中品的公案,后世人多有不平之鸣。关于此点,我倒有一桩小小的发见。就是鍾嵘原来是把陶公置于上品的,我的根据并不是近日所流行的《诗品》的板本,乃在《太平御览》第五百八十六卷文学类引《诗品》的地方。明明上品列有十二人,陶渊明正是其中之一。《太平御览》为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所辑,所据书当为唐本或五代本。今本置陶公于中品,想来系北宋以后如此,而且陶公的诗,颇合于鍾记室所举的“多非补假,皆由直寻”的标准。

从现代学术的观点来看,胡先生的推断并不准确,《太平御览》所载《诗品》将陶渊明引作上品显然是宋人改动的结果,也正拉开了陶渊明在宋代地位跃升的序幕。这里胡先生有为鍾嵘回护的意思,从中亦可看出胡先生欲在千古定论之外再加以开辟的努力。

此外,胡先生在批语中还提出一些极精邃的看法,值得表出。如在批《形影神》(并序)时,他指出:

陶善制序,谢善制题。姜词为陶派,柳诗为谢派。四言,如《停云》、《时运》、《荣木》、《赠长沙公族祖》、《答庞参军》皆有序,学《诗》序。五言,如《形影神》、《九日闲居》、《游叙川》、《答庞参军》、《与殷晋安别》、《赠羊长史》、《饮酒》、《有会而作》皆有序。《桃花源诗》有记,亦序也。《归去来》有辞有序。

古诗中有诗序者极少,而《毛诗》中的小序,亦有过度阐释之虞,离文学本体较远,亦无文学价值,而陶渊明则大量写诗序,长短不一,与正文相得益彰,

^①《胡小石论文集续编》,第79-80页。

《桃花源诗》之序甚至长于诗歌本文,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。南宋词人姜夔善于制序,其词序有时甚至长达数百字,论者认为,姜词之序与词“分而读之,序和词有着各自的文学规范和审美范畴;合而读之,它们又构成一个更大、更完美的整体”^①。这种体式的形成,从远源来看,确实可以追溯到陶渊明。胡先生在学术史上首次明确指出,白石词序之风源于陶公,可谓独具只眼。宋人陈郁《藏一话腴》评姜夔云“襟期洒落,如晋宋间人”,虽说的是其为人,但从胡先生的观察来看,其在文学上也与生活于晋宋间的陶渊明也有一丝联系。又如批《饮酒》其八“青松在东园,众草没其姿”,胡先生云:“屈原爱香草,每言‘兰蕙’。陶公于草木中乃独爱松,曰‘劲风’无穷,‘劲风无荣木,此荫独不衰’;曰‘连林人不觉,独树众乃奇’(《饮酒》);曰‘怀比贞秀姿’(《和郭主簿》);曰‘景翳翳以将入,抚孤松而盘桓’(《归去来辞》)。”胡先生的观察非常准确。诗歌意象的选择都是诗人主观情绪的投射,陶诗中频繁出现的“松”的意象,已经脱离植物界的意义,而是陶公傲岸、贞洁心志的体现,写松其实是在抒写自己。清吴瞻泰《陶诗汇注》卷三评上引《饮酒》诗云:“此借孤松为己写照也。”清温汝能《陶诗汇评》卷三亦云:“此篇语有奇气,先生以青松自比。”皆准确地把握住了陶渊明此诗的深刻内涵,以及陶渊明心志之象征。

总而言之,这部胡小石先生手批的《靖节先生集》在陶诗的文本训诂与陶公的文学史学渊源与影响都提出了新的看法,是不可多得的陶学研究新资料,值得研陶治陶者重视并加以利用。

附记:此书为金程宇先生最早发现,并提供线索,特此感谢。

作者单位:南京大学文学院

^①参见林顺夫著、张宏生译:《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——姜夔与南宋词》第一章《创作背景与创作行为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。又参见张宏生所作《译者序》,第6页。